学术专论

《四库全书》中民族语译音改译问题探析

姚艳芳

[摘要] 改译民族语旧译音是纂修《四库全书》的重要内容，故其缘由、过程、成果及影响是“四库学”研究不可忽视的内容。纂修《四库全书》时，在改译辽、金、元三史的基础上，进一步查改其余书籍中的旧译音，且以新译音书写敕撰类书籍。由方略馆承办改译事宜，同时调配内阁、清经字馆、翻书房等机构人员办理。一批精通翻译的大臣负责译音的具体查改，他们多是出身清书庶吉士的汉臣和本职从事内廷翻译的满臣。译音经官方统一后，史家或遵圣意，使用新译音；或为避免记载混乱，未用新译音；或反对人为改译。新译音虽未被私家著述广泛使用，但被清廷官方坚持使用。

[关键词] 《四库全书》　民族语译音　改译

[**中图分类号**] K24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5）－06－0103－015

四库馆臣纂修《四库全书》时，重点改译了旧籍中民族语译音。以改译辽、金、元三史民族语旧译音为主要内容，同时对其他书籍中的旧译音进行统一查改。目前，关于民族语译音改译问题的研究已有很多，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三史改译的缘起与过程，① 二是分析新、旧译

[收稿日期] 2024-05-23

[作者简介] 姚艳芳（1995—　），女，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48，1937704656@qq.com

① 例如，何冠彪《乾隆朝重修辽、金、元三史剖析》（《蒙古学信息》1997 年第 1 期）认为译改活动从乾隆十二年七月下令重修《金史》到三十年代后展开，从金史至辽、元二史，再到编修《辽金元三史国语解》是三史改译的主要内容，同时改纂清朝在此之前编纂史籍的相关部分，正史之外的其他史籍不只限于译音改译，对于原书中的议论、体例、书法都有所更改。刘浦江《从〈辽史・国语解〉到〈钦定辽史语解〉——契丹语言资料的源流》（《欧亚学刊》第 4 辑，中华书局，2004 年）梳理了《辽金元三史国语解》的编纂及成书时间，且发现虽规定以索伦语译改原《辽史国语解》，但译改后的《辽史国语解》绝大部分是以满语和蒙古语为依据，通过对部分新译音的考察，认为《钦定三史国语解》较为“荒谬”。金鑫《乾隆改定辽金元三史译名探析》（《满语研究》2009 年第 1 期）认为《钦定三史国语解》的始修时间是乾隆三十四年，认为改译时使用的索伦语应该是鄂温克语，当时改译是力求准确，并非随意而为。邱靖嘉《清修〈四库全书〉删改问题刍议——以校办〈三朝北盟会编〉为例》（《清史研究》2019 年第 2 期）分析改译工作类型分三种：一专办且编修《国语解》，二交对音官改译，三仍因旧文，未作改译。姚艳芳《〈四库全书〉编纂中对民族语译音纠误探析》（《贵州文史丛刊》2021 年第 4 期）考查了《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编纂始末及价值。从上可见，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了改译工作的起止时间、与改译相关的其他修纂事宜，以及从专业的民族语文知识角度来评价改译成果，促使《四库全书》中民族语译音改译的研究日渐细微。

音异同及改译方法，[①] 但在《四库全书》编纂完成后的民族语译音改译结果、具体改译参与者及历史影响方面的探究仍有所欠缺，故本文着重探讨这些问题。

一、改译辽、金、元三史的缘由及过程

改译三史是乾隆帝发起，由内廷各馆大臣执行的官方修史活动。在《圣制改译辽金元三史序》中，乾隆帝称："改译者不过正其讹误之语，而其旧史之布天下者自在也。读史者执旧简而证以新书，则可知语之异而事之同，则此序之不可不作，乃所以明吾志也。夫《春秋》一字之褒贬，示圣人大公至正之心。若辽、金、元三国之译汉文，则出于秦越人视肥瘠者之手，性情各别，语言不通，而又有谬寓嗤斥之意存焉。此岂《春秋》一字褒贬之为哉！"[②] 可见，改译三史一是为了厘正讹误；二是为了消除暗含于译音中的"嗤斥之意"；三是表示民族语文虽不同于汉文，但在叙述史实上有同样作用和地位，"语之异而事之同"，对音译字并不能表达"褒贬之义"。以往历代旧史沿袭旧译音，以讹传讹，有失"大公至正之心"。由此，为符合"春秋"史法，改译三史中民族语旧译音成为可行之事。

乾隆十二年（1747）七月乾隆帝下旨改译《金史·国语解》是改译三史的开端。乾隆帝校阅《金史》时，发现所附《国语解》讹误甚多，故谕："金源即满洲也，其官制、其人名用本朝语译之，历历可见。但大金全盛时，索伦、蒙古亦皆所服属，幅员辽广，语音本各不同。而当时惟以国语为重，于汉文音义未尝校正画一。至元臣纂修，又不过沿袭纪载旧文，无暇一一校正，讹以传讹，有自来矣。即如所解之中，或声相近而字未恰合，或语似是而文有增损。至于姓氏，惟当时音，而竟有译为汉姓者。今既灼见其谬，岂可置之不论？爰命大学士讷亲……用国朝校定切音，详为辨定。"[③] 乾隆帝先夸耀金国国势强盛，统御使用各种语言的不同族类，又指出金国以本族女真文为重，未曾规范译汉对音的书写，直至元朝史官纂修《金史》时仍沿袭旧文，致使史籍中民族语译音"讹以传讹"。尤其批评《金史国语解》中女真姓氏译为汉姓的内容，在现实中乾隆帝亦非常排斥满洲人改汉姓，曾下旨："向来满洲名氏，惟取清话之与汉字对音者，书写汉字，不得依附汉姓，故意牵混……此种陋习，断不可长……嗣后倘有仍前混写者，必当重惩其罪。"[④] 改译后的《金史国语解》亦将原本女真姓氏译汉姓的内容完全删除。至十五年下旨傅恒等重定国书十二字头音训时，指出："《元史》之'达鲁花赤'，以今蒙古音译之，当为'达鲁噶齐'……此类未易枚举，在史氏或以己意为音，或出于当时承习。盖由以汉字而注清语、蒙古语，既非本字，又无一定，是以讹复传讹，以此知官为校定之不可以已也。"[⑤] 此时乾隆帝指出蒙汉对译亦同满汉对译一般存在讹错，历代史书书写以讹传讹，各族语言切音方式不同，只用汉语切音，以汉文注音，不能做到准确无误，译音无定字，必须由清廷官方统一校正及规范。

---

① 例如，聂鸿音《〈钦定辽史语解〉中的唐古特语》(《华西语文学刊》第8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研究了《钦定辽史国语解》中使用藏语来译改的部分，认为译改结果并非出自一人之手，没有遵循统一的译音原则，没有恪守音韵规范，并在文中复原了其中的藏语词语。陈晓伟《〈庙学典礼〉四库底本与四库馆臣改译问题》(《民族研究》2016年第3期）将《庙学典礼》的四库底本中卷首《庙学典礼应翻译者》所列的改译条目，与正文相互对应，逐一复原民族语译音。刘凤强《宋金时期西北吐蕃若干人名探微——以〈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之唐古特语为中心》(《西藏民族大学学报》2023年第6期）一文认为《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一书是还原宋金时期西北吐蕃人名藏译的重要途径，仅采用音译的旧译音无法体现藏族文化而导致出现误译，新译音则可弥补这一缺失。这些论文侧重使用民族语文对新译音进行正误辨析，且作了进一步复原工作，有助于深入认识《四库全书》编纂中民族语译音改译的意义。

② 《金史》,《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9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1986年，第1-2页。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帝起居注》(第6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31页。

④ 《清高宗实录》卷500，乾隆二十年十一月辛巳。

⑤ 《清高宗实录》卷365，乾隆十五年五月辛酉。

至三十六年下旨依新《金史·国语解》来改译《金史》全书时，又称："其辽、元二史，俟《国语解》告竣后，亦即视《金史》之例，次第厘订画一。"① 从上述史料可见改译三史的大致过程。清以前各朝官方修纂三史时，沿袭旧史译音，未及厘正，故译音讹误尚多，又考虑金、辽、元三朝统治者族源与满洲相近，或"金源即满洲"，或"索伦、蒙古之隶臣仆"，故乾隆帝披阅其文其史时，由己推阐及之，将改译《金史》扩展至改译金、元、辽三史。

乾隆四十六年三史译改工作基本完成，据《纂修四库全书档案》记载"十一月初三日辛丑，吏部议方略馆总裁和珅等奏进呈辽金元三史告竣"，② 四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军机处遵旨查各馆纂办书籍已、未完竣及曾否刊刻、写入《四库全书》之处情况时，所附"纂办全竣现在缮写刊刻各书单"③ 中有辽金元三史、《辽金元三史国语解》。五十年十二月，"《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告成"。④ 是为初次编纂完成。

二、改译的机构及人员的调配

《四库全书》纂修过程中，对各部文献中民族语旧译音的改译是在皇帝下达谕旨后，由方略馆统筹各内廷机构的翻译人员，在相对集中的时间内完成的。

（一）负责对音改译事宜的机构

在内廷四阁全书办竣后，永瑢等奏议叙四库馆各项人员折中称："承办清字、西番、蒙古、托忒、回子等字之清字经馆、方略馆应行议叙人员，该馆自行咨部一体议叙。"⑤ 知《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清字经馆与方略馆办理涉民族文字事宜。覆校《四库全书》时，乾隆帝谕："所有武英殿、国史馆、方略馆、三通馆、翻书房，承办各种书籍，着派八阿哥、彭元瑞、金简会同该馆总裁督饬纂修、誊录等上紧赶办其四库馆应办各书。"⑥ 知翻书房协同办书。

翻书房由军机处兼管，又称"内翻书房"，满洲军机大臣兼充管理大臣，主要负责谕旨的满汉文翻译，及其他书文的译清，如经史、起居注、御论、册祝文、碑文等特需翻译。翻书房人员配置上，有"提调、协办提调各二人，收掌官、掌档官，俱各四人"，从本房行走官中委派，行走官又是从翰林院、詹事府、内阁中书、各部院司员笔帖式中选派，另有"翻译官四十人"，⑦ 都精通翻译。如可选派行走官的内阁中书"掌撰拟、翻译。分办本章处凡五：曰满本房、汉本房、蒙古本房、满签票处、汉签票处"，⑧ 有"满洲七十人，蒙古十有六人，汉军八人"，⑨ 分工详细，如蒙古房负责翻译蒙、回、藏各部文字。翻书房在承办《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时，呈奏折称："此书篇帙较多，兼有蒙古成语及缮写蒙古、清、汉三合切音等字，非熟习之人不能妥协……内阁派拨蒙古中书，国史馆派拨满汉誊录，其承办校对、帮办缮写，俱由臣翻书

---

① 《清高宗实录》卷 898，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戊寅。

② 《谕内阁纂修辽金元史之呈麟等准以在京应升之缺分别叙用》，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初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第 1432 页。

③ 《军机大臣奏遵旨查核各馆纂办书籍情形片（附单三）》，乾隆四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 1519 页。

④ 《清高宗实录》卷 1245，乾隆五十年十二月乙未。

⑤ 《多罗质郡王永瑢等奏遵旨议叙四库馆各项人员折》，乾隆五十年正月二十三日，《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 1853 页。

⑥ 《清高宗实录》卷 1315，乾隆五十三年十月癸卯。

⑦ 《清史稿》卷 114《职官一》，中华书局，1976 年，第 3271 页。

⑧ 《清史稿》卷 114《职官一》，第 3267–3268 页。

⑨ 《清史稿》卷 114《职官一》，第 3267 页。

房人员内拣派。”[1] 遇翻译困难时，翻书房可从内阁、国史院调员帮办。

清字经馆是乾隆帝为翻译《大藏经》特开的馆，据《清稗类钞》记载：“乾隆壬辰，高宗以大藏佛经有天竺番字、汉文、蒙古诸翻译，然禅悟深邃，汉经中之咒偈，代以翻切，未得秘旨，清文句意明畅，转可得其三昧。故设清字经馆于西华门内，命章嘉国师综其事，以达天莲筏诸僧助之。考取满誊录、纂修若干员，翻译经卷。先后凡十余年，《大藏》告蒇，四体经字始备。”[2] 由章嘉国师总理译经之事，后成《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一书。此时的章嘉国师即第二世章嘉呼图克图，乾隆十六年时，获授“振兴黄教大慈大国师”印，主管京师寺庙喇嘛及黄教各项事宜，曾参与纂修《同文韵统》等书。如三十七年曾下旨：“桂林等奏到土司图内地名，颇多舛误，未足为据，番地名目大率本之唐古忒居多，因令章嘉胡图克图，逐一查对，并用清字译出，详注图内，寄交温福。桂林嗣后该处土音为西番字所不能通者，并着询明该处土人，用清字对音，一并更定具奏。”[3] 又四十四年下旨：“《元史》内所载帝师名，及祝釐祷祠各名目，所译字样，自应与原解及原音相仿，惟字面如‘松之’为‘总之’类，尚与唐古忒音未合，着录出，发交章嘉呼图克图，阅看核定。”[4] 就此两则史料，可见章嘉呼图克图参与译音改译之事，负责过其中唐古忒文的翻译。

方略馆是军机处下设机关，“在隆宗门外咸安宫之左，凡本处档案皆藏库中。总裁无定员，以军机大臣领之。每次军功告蒇及遇有政事之大者，皆奏奉谕旨纪其始末，纂辑成书，或曰方略，或曰纪略，随时奏请钦定。亦有他书奉旨交辑者，均率在馆人员承办。其提调、收掌、纂修皆以满、汉军机章京兼充。提调，满洲二人、汉二人。收掌，满洲二人、汉二人。纂修，满洲三人、汉六人。内一缺由翰林院咨送编、检以上官一人充补”。[5] 可见，方略馆是军机处储藏档案之处，负责纂辑方略、纪略，也奉旨承办其他书籍。该馆总裁由军机大臣兼充，总领一馆之事。一般而言，清朝各修史馆内的提调负责都催稽核之事，收掌主管收发保存之事，纂修负责撰修之事，方略馆此三职中汉纂修可由翰林院咨送编修、检讨以上官充任，其他都由满汉章京兼充，满汉军机章京是“由军机大臣在内阁中书及六部司员中传取任用”。[6] 军机处“清字、汉字清档，每届五年由军机大臣奏请另缮一分，以备阙失。清字档令方略馆译汉官缮写，汉字档令内阁中书缮写，皆派本处章京二人校对”，[7] 而“方略馆设译汉官，乾隆初定为六缺，后因应翻译之件渐繁，随时由吏部传取，无定额。凡遇清字文案应译汉者，皆令译写成册，以备纂辑”。[8] 知方略馆译汉官既是军机处清字档缮写承办者，又是本馆及军机处清字文案译汉者，而军机处汉字档的缮写由内阁中书承办。方略馆设有校对，“由军机大臣咨取内阁中书兼充，无定员，凡馆中所纂书籍及所录清档，皆令分司校勘”，还设有供事，料理办书杂事，“亦无定额，由内阁、翰林院、詹事府等衙门传取”,[9] 供事并非官员，而是吏员，清代各衙门则例馆中都设置供事一职。此外，据张德泽所述：“据所存档案考查，有纂修、誊录、校对、文移各处及书库、纸库等单位。”[10] 可知方略馆还有誊录、文移各处及书库、纸库等。

综上，翻书房、清字经馆、方略馆人员同时参与民族语译音改译工作，因对音改译之事非

---

① 《翻书房为知照纂办〈满洲蒙古汉字切音清文鉴〉事致蒙古堂移会（附黏单）》，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第 1142 页。

② 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 8 册，中华书局，1986 年，第 4031 页。

③ 《清高宗实录》卷 901，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壬子。

④ 《清高宗实录》卷 1085，乾隆四十四年六月壬申。

⑤ 梁章钜、朱智：《枢垣记略》，何英芳点校，中华书局，1984 年，第 155–156 页。

⑥ 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学苑出版社，2001 年，第 24 页。

⑦ 梁章钜、朱智：《枢垣记略》，第 151 页。

⑧⑨ 梁章钜、朱智：《枢垣记略》，第 156 页。

⑩ 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第 28 页。

一般文臣可担任，故遇翻译事务繁杂时，可从内阁、翰林院、国史院甚至六部、詹事府中调员帮办。其中，方略馆是此次改译之事的主要承办机构。乾隆三十八年谕："宋铣……令其在方略馆效力行走，办理金元《国语解》及校订辽金元三史对音颇能尽心，该员在翰林中，学问尚优，着加恩授为编修，充方略馆纂修官以示鼓励。"① 四十年改译《明纪纲目》时谕："着交军机大臣，即交方略馆将原书改纂。"② 四十二年四月添派人员赶办三史折称："三史所用誊录、供事，向由方略馆拨派……所有一切事务，仍由方略馆提调办理。"③ 十一月下旨纂修《满洲源流考》时谕："至此项书籍，拟在方略馆就近办理。"④ 四十六年吏部"议方略馆总裁和珅等奏进呈辽金元三史告竣"，⑤ 可见统筹办理译语对音相关事务的机构是方略馆。

（二）参与民族语译音改译的人员

张升所著《四库全书馆研究》书后有《附录一　四库馆馆臣表》，⑥ 其中包含参与过改译事宜的人员，其标注为"文渊阁本、文津阁本副页所见少数民族文字校对官""对音官""《纂修四库全书》中所见少数民族文字校对官"。下面在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清实录》《文渊阁四库全书》等史料，考察参与改译民族语译音事宜人员的组成，补充整理如表 1。

表 1　民族语译音改译参与者一览表

序号	人名	参与译改、纂修、校对事迹	备注
1	宋　铣	译改辽、金、元、明史，纂修《满洲源流考》《大清一统志》，覆校《御批历代通鉴辑览》	庚辰科进士，清书庶吉士，以翰林院编修充方略馆汉纂修，充校对官
2	刘种之	译改辽、元史	丙戌科进士，清书庶吉士，以翰林院编修充方略馆协修
3	刘锡嘏	译改辽、金、元、明史	己丑科进士，清书庶吉士，以翰林院编修充方略馆汉纂修
4	王仲愚	译改辽、元史	己丑科进士，清书庶吉士，翰林院检讨
5	陈初哲	译改辽、元史，纂修《大清一统志》	己丑科进士，翰林院修撰，充方略馆纂修官
6	陈嗣龙	译改辽、金、元史，重修《八旗氏族通谱》《八旗通志》，纂修《钦定续通志》	己丑科赐进士及第，清书庶吉士，翰林院编修
7	孔广森	译改辽、元史	辛卯科进士，清书庶吉士，以翰林院检讨充方略馆协修
8	平　恕	译改辽、元史，纂修《满洲源流考》	壬辰科进士，清书庶吉士，以翰林院编修充方略馆汉纂修
9	李尧栋	译改辽、元史	壬辰科进士，清书庶吉士，以翰林院编修充方略馆汉纂修
10	黄寿龄	译改辽、元史	壬辰科进士，清书庶吉士，以翰林院编修充方略馆汉纂修
11	方　炜	译改《明史》，覆校《御批历代通鉴辑览》	壬辰科进士，汉书庶吉士，翰林院编修，充校对官

① 《清高宗实录》卷 944，乾隆三十八年十月丙戌。
② 《清高宗实录》卷 982，乾隆四十年五月辛酉。
③ 《刑部尚书英廉等奏拟再添派编修平恕等赶办三史折》，乾隆四十二年四月十二日，《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册），第 585–586 页。
④ 《军机大臣阿桂等奏遵旨纂办满洲源流情形折》，乾隆四十二年九月初八日，《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册），第 720 页。
⑤ 《谕内阁纂修辽金元史之呈麟等准以在京应升之缺分别叙用》，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初三日，《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 1432 页。
⑥ 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354–389 页。

（续表）

序号	人名	参与译改、纂修、校对事迹	备注
12	章宗瀛	译改辽、金、元史，覆校《金史》	乙未科进士，清书庶吉士，翰林院编修，充校对官
13	缪　晋	译改辽、金、元史，重修《八旗通志》	乙未科进士，清书庶吉士，翰林院编修
14	严　福	译改《明史》	乙未科进士，汉书庶吉士，翰林院编修
15	罗修源	译改《明史》	乙未科进士，汉书庶吉士，翰林院编修，方略馆协修
16	钱　棫	译改辽、金、元史，重修《八旗通志》	戊戌科进士，清书庶吉士，翰林院编修
17	呈　麟	译改辽、金、元史，纂修《满洲源流考》《盛京通志》	内阁中书，以内阁侍读充方略馆满纂修
18	穆　图	译改辽、金、元史，纂修《盛京通志》	笔帖式，以户部主事充方略馆满校对
19	七　德	译改辽、金、元史，纂修《满洲源流考》《盛京通志》	笔帖式，以笔帖式充方略馆满纂修
20	巴达尔瑚	译改辽、金、元史、纂修《盛京通志》《钦定续通志》	钦天监时宪科五官正，以理藩院员外郎充方略馆满校对，以理藩院主事充三通馆满纂修
21	依期善	译改辽、金、元三史	以内阁中书充方略馆协修
22	善　庆	译改辽、金、元史，纂修《盛京通志》	以候补笔帖式充方略馆协修、以户部主事充方略馆满纂修
23	巴　忠	译改辽、金、元三史	理藩院唐古特学司业，蒙古镶红旗人
24	达桑阿	改译辽、金、元三史	内阁中书，翻译戊戌科满洲举人
25	翰　图	重修《八旗氏族通谱》《八旗通志》	理藩院员外郎
26	巴尼珲	重修《八旗氏族通谱》《八旗通志》	按察使
27	曹锡宝	纂修《满洲源流考》《御批历代通鉴辑览》	癸未科进士，汉书庶吉士，以候补部员充方略馆汉纂修，刑部郎中充纂修官
28	邱庭漋	译改辽、金、元史，覆校《宋史》	乙未科进士，清书庶吉士，翰林院编修，充详校官
29	许兆椿	译改辽、金、元史，覆校《河源纪略》《元名臣事略》	壬辰科进士，清书庶吉士，以翰林院编修充方略馆协修，充覆勘
30	麟　喜	纂修《满洲源流考》	觉罗，正蓝旗人，以内阁侍读充方略馆满纂修
31	富炎泰	译改辽、金、元三史	满洲镶蓝旗人，甲戌科满洲进士，内翻书房行走，大理寺卿
32	朝　乐	译改辽、金、元三史，纂修《盛京通志》	以翰林院笔帖式充方略馆满校对
33	临　保	纂修《满洲源流考》	以理藩院笔帖式充方略馆译汉官
34	明　伦	纂修《满洲源流考》	正黄旗人，戊子科满洲举人，以候补笔帖式充方略馆译汉官
35	巴尼泰	纂修《满洲源流考》	以工部库使充方略馆译汉官
36	文　海	纂修《盛京通志》	以刑部笔帖式充方略馆满纂修
37	马廷模	纂修《盛京通志》	以大理寺笔帖式充方略馆满纂修
38	关　槐	纂修《盛京通志》《日下旧闻考》	庚子年赐进士出身，清书庶吉士，以翰林院编修充方略馆汉纂修
39	龄　椿	纂修《盛京通志》《钦定续通志》	以工部笔帖式充方略馆满校对，以工部笔帖式候补小京官充三通馆满纂修

（续表）

序号	人名	参与译改、纂修、校对事迹	备注
40	祝德麟	译改辽、金、元三史，编纂《三史国语解》《钦定续通志》	癸未科进士，清书庶吉士，翰林院编修充三通馆纂修兼总校
41	王坦修	覆校《御制增订清文鉴》《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西域同文志》《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宋史》	壬辰科进士，清书庶吉士，充覆勘
42	瑚图礼	覆校《辽史拾遗》《元名臣事略》	正白旗满洲人，丁未科满洲进士，庶吉士，充详校官
43	戴心亨	覆校《热河志》	乙未科进士，清书庶吉士，翰林院编修，充校对官
44	祁韵士	覆校《辽史》	戊戌科进士，清书庶吉士，翰林院编修，充校对官、覆勘
45	汪彦博	覆校《大清一统志》《金史》《辽金元三史国语解》	丁未科进士，清书庶吉士，翰林院编修，充覆勘
46	崇　年	编纂《钦定续通志》	以候补笔帖式充三通馆满纂修
47	明　达	编纂《钦定续通志》	以内阁帖写中书充三通馆满纂修

说明：表中序号 1-26 人物为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的《附录一　四库馆馆臣表》中“对音官”人员，其余人员为笔者补充整理。

资料来源：上表史料主要出自《纂修四库全书档案》《清高宗实录》《文渊阁四库全书》《八旗通志》。

据表 1 可见，参与民族语译音改译的人员有如下特点：1. 多是科甲出身，其中以壬辰科、乙未科最多；2. 多是清书庶吉士出身的翰林院编修，专务翻译的内阁中书、六部及内行衙署笔帖式也多参与改译；3. 乾隆朝翻译科出身的满洲举人及进士参与改译。经过整理发现办理译改事宜可大致分两个阶段，一是改译辽、金、元三史及依三史新译音书写敕撰类书籍，二是覆校时查改其他书籍中的旧译音。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军机大臣奏查《元朝名臣事略》人名改正情形，称：“系五十二年覆校文渊阁书籍时，经臣等派令纂办《通鉴辑览》之纂修，翰林等遵照钦定辽、金、元三史之例，将底本一体改正，交聚珍板照样排印。”① 可见覆校时负责查改书籍中旧译音的人员，有一部分是前期参与过各书译音改译的有经验者。值得关注的是，乾隆帝在三十七年壬辰科的殿试上以三史译语为题：“历代诸史，向敕馆臣校刊，嘉惠海内。近以辽、金、元三史人地官名多淆于后代儒生之手，或一人而两传，或一地而数名，至于释义对音，动成乖舛。因命重加厘正，务极精详。其余胪事系时，悉仍其旧。顾《金史》多本刘祁《归潜志》,《元史》多本虞集《学古录》。今以史文相核，率有矛盾，何耶？”② 可见乾隆帝不仅在内廷文臣面前，表达对旧史译音的关注，而且通过科举考试引发天下士子对旧史译音的思考。另外，纂修《四库全书》是以汉文文献为主导的，故参与具体纂修事宜的多是汉臣，而从满洲等非汉族官员参与改译事宜上可见清廷统一多元民族的特征。

乾隆帝言：“我国家承天庥命，建极垂统，至于今百四十年矣。汉人为臣仆者，自其高曾，逮将五世，性情无所不通，语言无所不晓。且今之纂修诸臣，即有善通清书兼习诸国字之人。则兹三史，必当及此时而改译其讹误者，是则吾于辽、金、元三代，实厚有造而慰焉。”③ 在乾隆帝看来，清廷已具备能够厘正旧史译音讹误的多重条件，从而规范民族语译音的书写，一是历

① 《军机大臣奏查〈元朝名臣事略〉人名俱经改正情形片》，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 2172 页。

② 《清高宗实录》卷 907，乾隆三十七年四月丙戌。

③ 《金史》,《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290 册，第 2 页。

经百余年的治理，满汉两族对彼此文化历史的认识不断加深，尤其满族对汉族语言文字的掌握，可谓“无所不晓”，能够深切理解汉文史籍；二是乾隆朝培养出通晓多种民族语言文字的专业人才，如清书庶吉士，为改译之事提供人才支持，使之能够集中完成；三是乾隆帝重视中国历史上其他非汉族政权的政治地位，熟悉辽、金、元三朝历史，使得厘正旧史译音得到最高统治者的关注。

三、《四库全书》各部文献改译结果

据《总目》正史类序言“宋、辽、金、元四史译语，旧皆舛谬，今悉改正，以存其真。其子部、集部亦均视此。以考校厘订自正史始，谨发其凡于此”。① 知将宋、辽、金、元史一体改译，包括官修正史及个人私修史籍，史部之外的子部、集部书籍亦照新译音查对挖改。

（一）史部文献的译改

据《总目》正史类序言知，编纂《四库全书》期间一体厘正了宋、辽、金、元四史中旧译音。其实，清廷官方所修《明史》及记载明朝史实的史籍也是改译的重点对象。当时官方纂修《明史》告成，已由武英殿刊刻。但是，乾隆帝披阅《明纪纲目》时，发现“所载青海朵颜等人名对音，沿用鄙字，与今所定《同文韵统》音字及改正《辽金元国语解》未为画一”，② 于是“着交军机大臣，即交方略馆，将原书改纂”，③ 几日后又谕令：“因思《纲目三编》虽亦曾经披览，但从前进呈之书，朕鉴阅尚不及近时之详审……又《明史》内于元时人地名对音讹舛，译字鄙俚，尚沿旧时陋习……今辽、金、元史已命军机大臣改正另刊，《明史》乃本朝撰定之书，岂转可听其讹谬？现在改办《明纪纲目》，着将《明史》一并查改。”④《明纪纲目》与《纲目三编》是同一书，在《四库全书》中定名为《御定通鉴纲目三编》，是乾隆三年八月命明史馆臣仿朱熹《通鉴纲目》义例编纂的明史史籍，成书于十一年闰三月。《明史》由清廷所开明史馆纂修，最早于顺治二年（1645）开馆纂修，而真正着手纂修在康熙十八年（1679）以后，直至乾隆四年（1739）最终告成，乾隆帝多年后因关注三史改译问题，下令一体改译《明史》，且随之校正其《本纪》《列传》部分内容，在五十四年缮录入《四库全书》。

乾隆帝曾言：“辽、金、元三史人地名音译讹舛，鄙陋失实者多，因命儒臣按《同文韵统》例，概行更录。盖正其字，弗易其文。以史者，所以传信示公，不可以意改也。兹阅所进《金史》，见其中文法多有未当者。如称元兵为大兵、大军，以元臣修《金史》，理固宜然。而于大兵、大军等句下，或接以上，或称朝廷，则又皆叙金朝事略，无界限分别，使浅学者观之，几不能辨其为何代语，是乃文义不佳之故，然此犹小疵，非若人、地名之谬误宜改，仍其旧可也……夫一代之史，期于传信。若逞弄笔锋，轻贬胜国，则千秋万世之史，皆不足信……然史书流传已久，难以厘正，亦不得不仍其旧。”⑤ 他认为三史旧史中存在“逞弄笔锋，轻贬胜国”的“文法”及“音译讹舛”两种错误，其中旧史中“文法”难改且流传已久，不得不仍其旧，相较而言，音译讹误易于厘正，故只是厘正三史民族语的对音字样，不改其文，以传信示公。而宋、辽、金、元、明五朝并存相继，时战时和，互有往来，史籍对五朝历史的记载总是不免提及彼此，以往历代修史者又未曾重视这些不同民族语译音问题，往往多承袭旧史，以讹传讹。纂修

---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 45，中华书局，1965 年，第 397 页。

② 《清高宗实录》卷 982，乾隆四十年五月辛酉。

③ 《清高宗实录》卷 982，乾隆四十年五月辛酉。

④ 《谕内阁改编〈明纪纲目〉着仿照〈通鉴辑览〉办理并查改〈明史〉对音讹舛之处》，乾隆四十年五月十八日，《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册），第 393–394 页。

⑤ 《金史》，《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290 册，第 2 页。

《四库全书》之机，正好可一体厘正史籍中民族语旧译音。正史之外，一同改译了《辽史拾遗》《契丹国志》《大金国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通鉴续编》等私家旧史。

此外，乾隆帝批阅《八旗通志》时，谕令："前因辽、金、元三史人地名原文，俱系当时国语，而后之修史者不谙文义，率以不善语言，为之译写。是以数年来，特命馆臣按照各史，不改其事，但将语言详加改正，锓板重修，遂使当时名爵山川，了如指掌。今以本朝之书，乃止仍原文开载，不为分晰注明，开列凡例，以定章程，是为前史尽心改正，而于本朝反不经意，不几贻笑将来，传疑后世，办理太属疏漏。"[①] 故乾隆朝敕撰史籍中的三史民族语译音依新译音撰写，其余旧时对音未合者依《同文韵统》切音译定。《四库全书》中依新译音撰写文献如表 2。

表 2 《四库全书》中依新译音撰写文献表

书目	依据
《钦定御批历代通鉴辑览》	金、元二史出自后代儒臣之手，大抵音译失宜，乖舛滋甚，历蒙指示以国语及蒙古语证合本音本义，无不确合，近又命喀尔喀亲王成衮札布进所藏《蒙古源流》一书，堪以互为考证，今并遵旨详加译改，仍于初见处注明旧作某某字样，俾开卷了然，足资考据。(《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335 册，第 8 页）
《钦定满洲源流考》	渤海以来之文字，金源以来之官制，亦皆并列。其体例，每门以国朝为纲，而详述列朝，以溯本始，其援据以御制为据，而博采诸书以广参稽，允足订诸史之讹。(《钦定满洲源流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499 册，第 468 页）
《钦定蒙古源流》	奉敕译进……数百年之承讹袭谬，得藉以厘订阐明。既已揭其旨于《御批通鉴辑览》，复以是编宣付馆臣，译以汉文。(《四库全书总目》卷 51，第 467 页）
《钦定热河志》	边外山水、地名多蒙古语，向无准字，我朝《同文韵统》切音精当，旧时对音未合者遵加校订，至书中所引辽、金、元人地名亦俱遵新定三史改正，以免沿习之讹。(《钦定热河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495 册，第 9 页）
《钦定河源纪略》	凡蒙古地名、人名译对汉音者，均照改定正史，详晰校正无讹。(《钦定河源纪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579 册，第 3 页）
《钦定盛京通志》	旧志于辽、金宗室，俱不载。又但志辽藩，不及吉林、黑龙江，未为该备，今悉增入，并遵钦定辽、金史，于旧讹姓名详译改正。(《钦定盛京通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501 册，第 26 页）
《钦定日下旧闻考》	书内辽、金、元人地官名，除诗词限于平仄不改外，余俱照新定国语改正，仍恭依钦定三史之例，于初见处注明音义及原作某某，今译改字样，并于卷首列译语总目。(《钦定日下旧闻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497 册，第 11 页）
《钦定八旗通志》	是为前史尽心改正，而于本朝反不经意……此书着交军机大臣会同该馆总裁重加辑订，详悉添注。(《谕内阁〈八旗通志〉办理疏漏交军机大臣同四库馆总裁重加辑订》，乾隆五十一年四月十九日，《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 1941 页）
《钦定八旗氏族通谱》	因思从前重修《八旗氏族通谱》时……曾添派办过辽金元三史人地名对音之清书翰林陈嗣龙……帮同核办。(《军机大臣阿桂等奏遵旨议奏添纂〈八旗通志〉情形折》，乾隆五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 2226 页）
《钦定皇朝通志》	若本朝《八旗氏族通谱》于各族得姓所始……今并以类胪次……御定《同文韵统》……于是字无遁音，书皆备韵，近复将辽、金、元、明诸史之传讹者，考正改译，亲加详定。至于番部舆图、释家梵典，一经翻译，并得准声，洵足正千秋之谬误……并详列于篇。(《皇朝通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44 册，第 5-6 页）

① 《谕内阁〈八旗通志〉办理疏漏交军机大臣同四库馆总裁重加辑订》，乾隆五十一年四月十九日，《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 1940-1941 页。

（续表）

书目	依据
《钦定续通志》	辽、金、元三朝氏族未有专书，今详加搜（《钦定续通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392 册，第 12 页）
《钦定历代职官表》	《元史・百官志》：大宗正府，秩从一品，国初未有官制，首置断事官曰札尔呼齐（原作札鲁忽赤，今改正）。(《钦定历代职官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01 册，第 36 页）

这些史籍以记载边疆史地、民族历史、历代典制为主要内容。新译音书写的史籍，部分厘正了旧史译音讹误，更换掉暗含贬义的字眼，肯定了新译音的使用价值。

（二）子集部文献的译改

《四库全书》编纂完成后进入覆校阶段，任务之一是改译子部、集部文献中的辽、金、元三史人地官译名。据记载，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四库馆全书四分告竣”。① 在五十二年五月，乾隆帝下旨校阅文津、文渊、文源三阁《全书》，五十四年十一月，又下旨陆锡熊前往盛京，校阅文溯阁《全书》。谕令校阅文津等三阁《全书》的次月，即五十二年六月，曾参与过改译的祝德麟就奏请：“所有各书中关涉辽、金、元三朝事迹，不独史部所载繁多，子、集二部当亦不少，允宜遵照《三史国语解》一律改正。惟当日纂办之时，以三史各名尚未译定，无凭照改，大率俱从其旧。现奉谕旨，命尚书以下大小各员分勘文渊等阁四库书籍，日有程课，字字行行均须寓目，似宜趁此校阅之际，遇有三朝人、地、官名，即签出某书、某卷、某页、某行，详登档册，既可省将来一番寻检之烦，并不虞于疏漏。仍请敕下武英殿总裁，赶紧将《三史国语解》一书刊刻完竣，详晰校对，先刷清本呈览。恭候发下之日，刷印多本，分给现签档册各员，赴阁领书，查对挖改，仍派方略馆原办之满纂修会同悉心校核，以昭详慎，而衷一是。”② 这一奏请获得乾隆帝的认可，次日，军机处就传谕永璇等“将现在武英殿所刻《三史国语解》赶紧刊刻完竣，先刷印一部寄至热河，以便校对，其余分给文渊、文津两阁校书诸臣，一体留心查改”。③ 然而，查改辽、金、元三史人地官译名并不是容易之事，五十二年十月，校办文津阁书的纪昀奏请：“惟是文渊、文源二阁校正册籍，俱为刘墉、彭元瑞留为校理三分全书之用，其订正译语册档，亦未付臣。所有辽、金、元人地名，俱无从查改。应奏明请旨敕下刘墉、彭元瑞，将二阁翻译册档，以一分留京备用，一分移送热河照改，庶两无贻误。”④ 至五十三年正月，纪昀又上奏：“至诸书应改之翻译，臣督率总校照册细查，先归架者陆续挖填，后归架者亦挨次修补，并已将完。”⑤ 知文津阁书依文渊阁或文澜阁翻译册档进行挖改。陆锡熊负责文溯阁译语查改工作，五十五年三月上奏：“至各书内辽、金、元人地名应译改者，臣等现令汇册记明。查编修邱庭漋原系文渊阁详校时承办翻译之人，即令其于收发外，将带来翻译各档逐一查对，详悉改正。”⑥

① 《谕内阁全书四分告竣所有总裁总阅总纂等交部从优议叙》，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 1822 页。

② 《掌湖广道监察御史祝德麟奏请将〈三史国语解〉刊刻完竣呈览折》，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初二日，《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 2018–2019 页。

③ 《寄谕八阿哥永璇等将武英殿所刻〈三史国语解〉赶紧刊刻完竣》，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初三日，《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 2020 页。

④ 《礼部尚书纪昀奏请将文渊阁翻译册档移送热河一分等事折》，乾隆五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 2081 页。

⑤ 《礼部尚书纪昀奏来热河勘书完竣并查明阙失颠舛各书设法办理折》，乾隆五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 2115 页。

⑥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陆锡熊奏详校文溯阁全书办法折》，乾隆五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 2174 页。

乾隆帝在五十五年十一月传谕军机大臣调查译音查改情况，军机大臣回奏："臣等遵旨查辽、金、元三史应改之人地名对音，先经武英殿将板片挖改，刷有样本。嗣经校出错讹之处，付殿改刻后，于乾隆五十三、四等年陆续交馆，尚须将原办底本覆加校对，始行刷印。而底本只有一分，其时正当赶办四阁空函书籍及江浙三阁之书，均经移取此项底本校办。本年复带往盛京覆勘文溯阁全书。现又将底本覆校，摛藻堂《荟要》，尚未完竣。臣等现在行催，一俟交回底本，即行赶紧核对板样，刷印颁发。"① 结合上引史料，可知覆校时查改文献内三史译音的程序。由于《辽金元三史国语解》未刊刻完成，所以馆臣先行校勘，签出书中应译改之处，汇为应翻译档。而武英殿先将三史改译之处挖改刷出样本，由馆臣校出错误之处，再次改刻，这样刊出《三史国语解》底本，应是五十二年六月之后刊刻的，五十三、四年陆续交馆。交给七阁校对者后，校对者与之前登记好的翻译档册相互对照以查改各书。但是《三史国语解》底本尚需校对，才能达到校办全书的标准，而七阁校书时间紧张，未等到底本完全校对完就开始使用挖改全书。五十五年十一月时，覆校底本完成，才能最终刷印颁发至归阁。在这之前，纪昀奏请将文渊、文源阁翻译册档寄至热河，查对文津阁应译改之处，五十三年正月即上奏称译改将已完成。而陆锡熊先自行将应翻译之处汇成档册，五十五年由邱庭漋带着《三史国语解》底本直接覆勘。如此看来，实际操作上，覆校阶段的各阁书籍的改译上存在很多出入，且查改译音是覆校过程中一大难题。

四、改译旧史民族语译音的历史影响

嘉庆二十三年（1818），嘉庆帝下令方略馆诸臣"将辽、金、元三史中人名、地名、官名，悉遵《钦定国语解》改正，仍于所改名下注明原作某，以存其旧"，② 道光帝在嘉庆二十五年十月谕："武英殿刊刻各馆书籍，交原馆校对，有迟至十余年未经办竣者，实属延缓……又方略馆订正辽、金、元三史，校勘难于速竣，请勒限于道光二年校竣，送武英殿"，③ 至道光二年（1822）十二月，大学士曹振镛等奏："方略馆有应校辽、金、元三史……惟原板模糊脱落及蠹烂之处甚多，应另行刊板以垂久远，计缮写副本、正本、殿本共三分，未能刻期完竣，请再展限一年，以便缮对无讹。"④ 最终书成于"道光三年"。⑤ 综上，在《四库全书》纂修完成后，三史民族语译音的改译仍在继续，嘉庆帝、道光帝继续谕令方略馆馆臣进行改译及校勘，直至道光三年殿本书成。

赵翼在其《廿二史劄记》的《补遗》中记："臣纂辑《廿二史劄记》时，第就坊刻《辽》《宋》《金》《元》《明》旧史为据。今蒙高宗纯皇帝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所有人名、官名、地名一一翻译改正，始知数百年以来皆承讹袭谬，今日方得本音，诚千古不刊之书，读史者宜奉为准的。第恐外间坊刻旧本正多，不能家喻户晓，臣谨逐一录出，转以旧名在前，今名在后，使人知旧本如此，今本如此，读史者可不迷于检阅焉。"⑥ 赵翼是乾隆二十六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廿二史劄记》三十六卷是其考证历代正史的读书札记，又《补遗》一卷，专记三史新旧译名。《通鉴辑览》一书原于乾隆三十三年撰成，三十六年乾隆帝披阅时下旨改译旧译音，在《通鉴辑览》书前改译重纂的职名表中见有"纂修官翰林院编修今任贵州贵西道臣赵翼"，⑦ 可知赵翼

① 《军机大臣等奏遵旨查辽金元三史挖改情形片》，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 2221 页。
② 梁章钜：《退庵随笔》卷 16，道光十六年刻本。
③ 《清宣宗实录》卷 6，嘉庆二十五年十月丁亥。
④ 《清宣宗实录》卷 47，道光二年十二月己未。
⑤ 梁章钜：《退庵随笔》卷 16，道光十六年刻本。
⑥ 赵翼：《廿二史劄记》，曹光甫校点，凤凰出版社，2008 年，第 572–573 页。
⑦ 《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335 册，第 15 页。

熟知对音译改之事。赵翼编撰《廿二史劄记》时以坊间旧刻为据，坊间尚未有改译重纂的三史，故作《补遗》便于坊间读书人检阅，将乾隆帝圣谕及新译音逐一录出，单独作一卷。其书中卷二十三至卷三十记宋、辽、金、元史，遇应译改之处注明新、旧译音，例如“传至聂哷（旧名雅里）”①，可见此书使用了新译音。如其所言，读史者要奉新译音为“准的”，《补遗》可补坊间书在旧译音讹误上的不足。从《补遗》中先列译改圣谕及“臣纂辑”“臣谨”的自称上，可见《补遗》与一般史学札记的文风有异，体现出赵翼对官方改译旧史的恭敬。

章学诚在嘉庆三年为汪辉祖《三史同名录》作序，称：“辽、金、元三史人多同名，如前人所论，元有五伯颜、四脱脱，金有两娄庐火、三韦室，辽有两萧韩家奴，其类甚多。汪上湖《韩门缀学》尝论及之，且云或谓译无定字，同名者不妨易换同音之字，若辽之‘耶律挞不也’与‘耶律塔不也’，挞、塔异文，‘阿里海牙’与‘阿礼海牙’，里、礼异文，可以示别。汪氏以谓同者太多，势难尽变，是固然矣。抑有未也，译取同音，本无定字，史官以私意改易字形，取其易于分别尔，假如挞甲而塔乙、里丙而礼丁，惟史官得自知之，他处纪载仍可彼此互换，或一概无分，盖本无一定不易之义例，其势自不能尽人皆心喻也。故汪氏之说，徒虑太多不能尽变，不知纵能尽变，其势亦不行也……夫对音翻译，文字无多，名字相同，触处多有，作史者自应推《春秋释例》，兼法古人《同姓名录》，特撰为《同名考》，将全史所载，毋论有传无传之人，凡有同名，详悉考别，勒为专篇，与《国语解》并编列传之后，岂不轩目豁心，可为久法。”② 这篇序文主要叙述汪辉祖《三史同名录》体例的恰当，反对汪上湖用更换同音之字的方法来解决三史同名者多的问题。汪师韩，号韩门，又号上湖，雍正十一年（1733）进士，后改清书庶吉士，乾隆元年散馆授翰林院编修。作为清书庶吉士，必然熟悉对音翻译之事，他认为民族语译音无定字，所以改易字形可成为著史者避免重复的方法，但是存在同名太多不能尽变的难题。章学诚则认为史家以私意改换译音字样，会造成史籍记载混乱，既然译音“本无定字”，那么不如不改，直接考证汇辑三史同名者则是更好的办法，故他称赞汪辉祖编纂《三史同名录》。汪辉祖，号龙庄，乾隆四十年进士，任地方官，晚年多著述，《三史同名录》由其所撰，其子汪继培补撰而成。嘉庆六年自序：“取三史中以国语命名者，重为编辑……族以名行，人不姓系，而又取于官于地于事于物于姓氏，国俗相沿，语必叠字，对音翻译，文难数通。以视汉字汉语者，广隘难易，相悬万万，袭蹈故常，渐难别白，势使然也……若夫译音无定，旧史多舛，馆臣奉诏厘正，一洗沿袭之陋。辉祖僻处草茅，末由仰见，录内人名仍以武英殿旧刊为据，后之君子，读定本而别有成书，是编真当覆剖置之矣。”③ 据其自序可见，因三史人名独特性故著此书，也解释汉人在考校对音翻译上存在很大困难，故作史只能“袭蹈故常”。他以乾隆四年武英殿旧刊本为据，虽然当时内廷馆臣已奉诏厘正译音，但此书没有使用新译音撰写，因为身处僻处的他未能阅看。汪辉祖曾将二十四史列传及附传人姓氏依韵编次，汇辑为《史姓韵编》，书中“辽、金、元三史中标名不著姓，及姓须译改者，俱依韵另编为一卷，而以《明史》中名姓类三史者附焉”，④ 也可见他对三史人名改译处有所了解。章学诚为《三史同名录》作序时，提出该书可与《国语解》并编在史籍列传后，由此读史者可“轩目豁心”。他提出折中办法，考订三史同名人与改译三史人名译音可视为独立之二事，改译是厘正旧史译音，而同名录则是姓名索引，二者对校理旧史都有积极作用，也为汪书不用新译音书写作了合理解释。

汪辉祖与钱大昕是好友，在《三史同名录》序言中称：“曩岁曾缮初稿，就正嘉定钱竹汀宫

---

① 赵翼：《廿二史劄记》，第 389 页。

②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二》，《章氏遗书》第 8 卷，商务印书馆，1936 年，第 259–260 页。

③ 汪辉祖：《三史同名录》卷 40《叙录》，《丛书集成初编》，第 3295 册，中华书局，1985 年，第 399–400 页。

④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中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 年，第 1238 页。

詹，多蒙教益。”[①] 钱大昕，号竹汀。汪辉祖在撰写《元史本证》时亦借鉴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于时贤之订《元史》者，独取钱竹汀考异”。[②] 钱大昕是乾隆十六年南巡因诗赋而特赐的举人，授内阁中书，十九年中进士，改汉书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钱大昕也曾在其史著《廿二史考异》书后案语中称：“辽、金、元三朝，人名、官名、地名，旧史颇多舛讹，由当时史臣未通翻译，以至对音每有窒碍，且有一人而彼此互异者。现奉圣旨，饬令馆臣逐一厘定，足洗向来沿袭之陋。是旧成于乾隆庚子，所据系武英殿旧刊本，俟颁下定本到日，遵照改正。”[③] 可见钱大昕知晓馆臣改译旧史之事的来龙去脉，并以此案语解释该书未用新译音的原因。但是，在《廿二史考异》中多次记载他对译语对音之事另有看法。例如：对“蠕蠕”的解释，就《晋书卷五・冯跋载记》中“蝚蠕勇斛律”，案：“蝚蠕即柔然也。《魏书》作‘蠕蠕’，宋、齐、梁书皆作‘芮芮’，《周书》作‘茹茹’，《北史》有蠕蠕传，而诸传间有作‘茹茹’者，盖译音无定字”，[④] 解释“蠕蠕”“芮芮”“茹茹”“蝚蠕”“柔然”皆是译音，只是同音异字而已，因译音无定字，无所谓言之正误。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宋纪七》云：“芮芮，即蠕蠕，南人语转尔”，[⑤] 注《梁纪十五》云：“魏明元帝命柔然曰蠕蠕，谓其蠕动无知识也。阿那瑰封蠕蠕王，虽曰以为国号，犹鄙贱之也。至高欢纳其女，号曰蠕蠕公主，则径以为国号，不复以为鄙贱矣。蠕，人兖翻”，[⑥] 所以胡三省一是解释“芮芮”为南朝人语“蠕蠕”的转音，二是魏明元帝称北方“柔然”为“蠕蠕”以侮辱之，“蠕”的音是 ran。钱大昕又对胡注作案语：“柔然北方之国，不通中华文字，史家据译音书之，或称茹茹，或称芮芮，其实即柔然二字之转也。(柔然、茹芮同属日母)明元易茹为蠕不过借同音字，寓蚩鄙之意，元非改其国号，《北史・后妃传》中或称蠕蠕公主，或称茹茹公主，犹言柔然公主云尔。《通鉴》于纪事例称柔然，而述魏人之词则曰蠕蠕，至如阿那瑰之封王，其女之称公主，亦当从纪事之例，偶沿旧史元文，不及画一，刊改注家未通译语，又从为之辞殊多事矣。”[⑦] 钱大昕解释“茹茹”“芮芮”是“柔然”的译音汉文字样，魏明元帝改“茹”为“蠕”，借同音字，专意寓蚩鄙之意。指出《魏书・蠕蠕列传》记载：“改其号为蠕蠕”[⑧] 的说法是错误的，“蠕蠕”并不是柔然的国号，《通鉴》中兼用两种字样记载相关史实，一是普通纪事用“柔然”，二是记述魏之词时用“蠕蠕”，尊重史实，实事求是，这里“蠕蠕公主”应当写为“柔然公主”，是《通鉴》沿袭旧文之讹误，是因刊改注家不通译语造成的混乱。而《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总目》提要中提及“蠕蠕”，言：“初非以字之美恶分别爱憎也，自《魏书》改柔然为蠕蠕，比诸蠕动，已属不经。”[⑨] 提要纂修官只是将《魏书》“柔然”改“蠕蠕”作为译语对音中以字之美恶寓爱憎之意的例子，批判这种作法荒诞不经。

相对于钱大昕从史籍撰写体例上批判及“译音无正字”的态度，代表清廷官方态度的《总目》更显激进。随后，此提要内容又称：“元托克托等修宋、辽、金三史，多袭旧文，不加刊正。考其编辑成书，已当元末。是时如台哈布哈号为文士，今所传纳新(案，纳新原本误作迺贤，今改正)《金台集》首有所题篆字，亦自署曰“泰不华”，居然讹异。”[⑩] 其中“台哈布哈”，

① 汪辉祖：《三史同名录》卷 40《叙录》，《丛书集成初编》，第 3295 册，第 400 页。
②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上册)，第 347 页。
③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下册)，方诗铭、周殿杰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 1367 页。
④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上册)，第 387 页。
⑤ 《资治通鉴》卷 125《宋纪七》，中华书局，1956 年，第 3946 页。
⑥ 《资治通鉴》卷 159《梁纪十五》，第 4928−4929 页。
⑦ 钱大昕：《通鉴注辨正》卷 2，乾隆五十七年戈宙襄刻本。
⑧ 魏收：《魏书》卷 103《列传第九十一》，中华书局，1974 年，第 2289 页。
⑨ 《四库全书总目》卷 46，第 415 页。
⑩ 《四库全书总目》卷 46，第 415 页。

也作“泰哈布哈”，[①] 都是“泰不华”的新改译字样，《金台集》是元朝人廼贤所著文集。《元史·泰不华传》著：“初名达普化，文宗赐以今名”，钱大昕案：“予见至正三年《松江府庙学记》，题云：绍兴路总管兼管内劝农事知渠堰事泰普华篆额，‘普华’即‘不华’也，译音无定字，‘达’与‘泰’不过音之转，‘普化’与‘不华’，北音亦无异。兼善登第时，榜书‘达普化’，后来受制命又作‘泰不华’，故史以为文宗赐名。然当时士大夫多以‘达兼善’称之，或称为‘达秘书兼善’，亦自题‘泰普华’，可见赐名之说，未足深信”。[②] 其一是考证了泰不华名字的来源，否定了《元史·泰不华传》所言“赐名”之说；二是两种书写，是转音与译音不同导致的，译音本就无定字，两种兼可；三是泰不华认同自己名字，不足为怪，正如此书提要内容开头所言：“考译语对音，自古已然。《公羊传》所称地物从中国，邑人名从主人是也”。然而《总目》却言“居然讹异”，并进一步解释为“盖旧俗已漓，并色目诸人亦不甚通其国语。宜诸史之讹谬百出矣”，且引出改译三史《国语解》，“前代译语，更非所谙。三史所附《国语解》，颠舛支离，如出一辙，固其宜也”。[③] 首先可见，在旧史译语对音上，钱大昕与《总目》存在不同认识，再有钱大昕著史亦未轻易使用新译音，同汪辉祖一般使用武英殿旧刊本。其实可以看出，钱大昕对官方主持的人为统一改译旧史的作法是不赞同的。

咸丰年间，何秋涛考述西北史地沿革，编成《北徼汇编》八十卷，此书得咸丰帝赐名为《朔方备乘》。书中有作者案语：“辽、金、元三史人名、地名对音未能确当，前于乾隆年间曾经改定，兹因兼采诸家文集，说部互相考证，若概行改依对音，则考订之处，转觉歧互，是以仍载原名，加以考订。”[④] 所以若遇同名异译的情况，作者在案语中注明新、旧译音。可见新译音易造成史籍记载的混淆，这是私家著述不直接使用新译音的重要原因。

1956 年，陈垣在审查山西师范学院《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书稿时，言：“介绍到辽、金、元史，应向同学声明此书有原本，有清乾隆时改译本，乾隆时，因这样书译名字眼不雅，遂命将全书译名改译，改得一塌糊涂……清末编教科书的又均用改译本，因此凡受过清末教科书教育的，都先入为主，以乾隆改译的为正。如‘托克托’‘忽必赉’之类，不知道原本实作‘脱脱’、‘忽必烈’了。此稿介绍宋、辽、金史时，亦作托克托撰，经人指出，改正为‘脱脱’，对了，但仍注云‘亦作托克托’，似系当时异译，不对。因此等异名系后人改译，不是当时异译，如果要注，应注云‘乾隆时改译托克托’才对。”[⑤] 从中可见，一是直至清末三史教科书均使用译改本，读书人皆以改译本为正；二是新译音造成史书记载混乱，对阅读史籍造成不好的影响，故逐渐恢复使用原本。

五、结语

乾隆帝特别关注史籍中存在的民族语译音讹误的问题，下旨凡涉及辽、金、元三史人地官名及一切象物名称的旧史皆需依新译音改译，使得改译活动几乎贯穿编纂《四库全书》的整个过程，甚至起止时间远比《四库全书》编纂时间还长。通过阐述《四库全书》中辽、金、元三史的改译以及查改其他旧籍中民族语译音的过程，可见改译事宜由方略馆统筹，调配翻书房、清字经馆、内阁等内廷机构人员协助办理，具体改译参与者多是熟悉清书的翰林院庶吉士及本职专务内廷翻译的内阁中书、笔帖式等人员。对于新译音，出于避免造成史籍记载混乱的考虑，

---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 167，第 1450 页。

②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下册），方诗铭、周殿杰校点，第 1323 页。

③ 《四库全书总目》卷 46，第 415 页。

④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 35《传五》，光绪刻本。

⑤ 陈垣著，陈智超编：《陈垣四库学论著》，商务印书馆，2012 年，第 73 页。

未被私人著述广泛使用，但史家不敢违背圣意，也会在书写中使用，只是要注明有新、旧译音的变化。官方则坚持使用新译音版三史作为教科书，晚清读书人以改译本为正。同时，钱大昕从考证入手，间接反驳了《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的《总目》提要内容，坚持中国传统史籍“名从主人”的史法，遵从“译音无定字”，认为旧史译音中同音异字造成的史籍记载失误，可资考证，而人为改译做法已脱离“译音无定字”的史法。当然，乾隆帝自然明白旧史遍布于民间，表示“改译者不过正其讹误之语，而其旧史之布天下者自在也。读史者执旧简而证以新书，则可知语之异而事之同”，厘正旧译音是为了让读史者知道“语之异而事之同”，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字与汉语汉文的作用是一样的，地位是平等的。近代以来，为方便阅读，逐渐恢复对原译音的使用。

References

Qiu Jingjia. “Qing Xiu *Siku Quanshu* Shangai Wenti Chuyi: Yi Jiaoban *Sanchao Beimeng Huibian* Weili”(Discussion on the Issue of Revising the Books during Compiling *Siku Quanshu* in the Qing Dynasty: Taking the Revision of *Sanchao Beimeng Huibian* as an example). *Qingshi Yanjiu*(The Qing History Journal) 2 2019.

Analysis of the Transliteration and Revision of Ethnic Languages in the *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

YAO Yanfang（School of History,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1937704656@qq.com）

Abstract: Revision of old transliterations of ethnic languages was a crucial component of the compilation of the *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 (*Siku Quanshu)*. Therefore, its reasons, process, achievements, and impact are crucial topics in *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 studies. During the compilation of the *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 in addition to revising the Liao, Jin, and Yuan histories, the old transliterations in other books were further reviewed and revised, and the imperially compiled books were written in the new transliterations. The Fanglue Academy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revision, and personnel from the Cabinet, the Qing Jingziguan, and the Translation Office were also assigned to handle the revision. A group of ministers proficient in translation oversaw the specific revision and revision of transliterations. These ministers were mostly Han officials who had graduated from the Qing Dynasty's Shujishi and Manchu officials who had been translators for the imperial court. After the official standardization of transliterations, historians either followed the emperor's wishes and used the new transliterations; or, to avoid confusion in their records, they refrained from using the new transliterations; or, moreover, opposed the artificial revisions. Although the new transliterations were not widely used in private writings, they were consistently used by the Qing court.

Keywords: *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 translation of ethnic languages, modify transliteration